

数典勿忘祖,“显学”隐巨擘 ——为司马迁目录学成就正名

王锦贵

摘要 在传统文化领域里,目录学素有“显学”之称。由于种种原因,史学家司马迁在目录学领域至今尚无一席之地。本文以事实表明,《史记》是一部空前规模的隐性书目文献。《史记》中隐含着目录学的理论和款目组织;辨析先秦诸子学术分野,揭示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考镜诸子学术源流,历数著述及学术成就,并以“互见法”揭示文献内容。《史记》对《汉书·艺文志》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书都以国史平台展示图书文献,重视学术流派的辨析,重视图书层面的内在联系。司马迁为目录学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参考文献 8。

关键词 司马迁 《史记》 目录学 隐性书目

分类号 G257

The Unknown Bibliographic Achievements of Sima Qian

Wang Jingui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ibliography is regarded as a notable doctrine. However, for certain reasons, Sima Qian, one of the most famous historians in China, was not given acknowledgment in bibliographic field. Many facts indicate that the book of *Shih Chi* is an unprecedented tacit bibliography. *Shih Chi* implied the theori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ntries in bibliography, differentiated and analyzed the dividing line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by pre-Qin thinkers, revealed the life stories of representative figure, examined the academic sources and courses of the scholars, enumerated writings and academic success, and revealed the contents of documents by the method of coreference. *Shih Chi* has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Record of Art and Cultur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both of which presented books and docum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historie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analyses of academic schools 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 Today,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fundamental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Sima Qian to bibliography. 8 refs.

KEY WORDS Sima Qian. *Shih Chi*. Bibliography. Tacit bibliography.

我国书目实践的历史极其悠久。按照王重民先生的“甲骨文观点”,这一领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距今 3000 年前的殷商时代。即使从孔子整理“六经”算起,也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了。以汉代刘歆所编《七略》为起点,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各种大型书目异彩纷呈,成就辉煌。其中最为人关注的书目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由中央政府

组织人力物力整理国家藏书而成的“官修书目”,二是由历代著名史学家在官修书目或相关书目基础上编制的“史志书目”,三是由民间学者根据个人藏书、著述或本人关注范畴的图书编纂而成的“私修书目”。

由于书目明显的治学功能和社会需要,不单由此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录学,而且随着文

通讯作者:王锦贵, Email: wjgw@pku.edu.cn

化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的学术地位也迅速攀升。犹如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儒、墨两家成为当时的“显学”那样,目录学至晚在清代乾嘉时期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这门“显学”究竟“显”到何种程度?著名学者王鸣盛的几句话可谓醍醐灌顶:“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1]

考察传统书目文献之佼佼者,后人似乎早已形成了清晰的共识:《汉书·艺文志》反映了汉代及先秦时期的学术文化,《隋书·经籍志》反映了隋代及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文化,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做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是一部集大成之作。

1 从《四库全书总目》说起

《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总目》、《四库总目提要》或《四库提要》。该书是清代最大的一部解读书目,也是打开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存世古籍的一把极其重要的钥匙。此书究竟有多大影响呢?国学大师余嘉锡在其《四库提要辩证》中的切身感受可谓言之凿凿:“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

纵观古代书目文献,上乘之作都必须具备两大要素:一是基本理论的正确指导,二是众多款目的完善组织。前者是务虚层面所必备的相关理念的展示和演绎,后者则是务实层面所必须的书目款目的具体揭示和建设。二者彼此为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没有前者,后者便是一盘散沙;没有后者,前者就成为空中楼阁。

《四库全书总目》之所以被视为古代书目的集大成之作,因为该书不仅具备了上述两大要素,而且成就之优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1.1 书目理论

作为一部全面继承并且发扬汉代《七略》以来

目录学优良传统的代表作,《四库全书总目》的书目理论令人钦佩。

以书目文献所必备的理论要素为例,《四库全书总目》根据图书的学科内容和特定的分类标准,对著录的所有文献逐一分门别类,最终形成了包括一级类、二级类、三级类(属)的完整的分类体系^[2]。在这个分类体系中,无论在任何一级的图书分类中,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简明序言这种形式的文字说明。例如在一级类中,以篇幅较长的大序(部序)说明该类文献的性质、历史、源流和特点;在二级类及三级类(属)中,同样以适当篇幅的类序做出必要的理论解说。不仅如此,本书还通过凡例(20则)、款目按语以及书目提要等形式,逐一在相应地方做出必要的论列和提示。

从表面上看,纂修者的思想理论似乎被分割于各个地方、各种形式之中,并不是汇聚在一起的所谓完整模块。然而恰恰是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亦即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的不同形式,才使得该书的基本理论得到全面、彻底的落实,使纂修者的指导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四库全书总目》理论层面的运作,凸显三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将该书收录的所有图书(无论是正式著录的,还是作为“存目”著录的)各就其位,由此构筑成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机体,成为便利后人读书、治学的一把利器。第二,充分反映纂修者有关分类的思想理念和标准,使读者对该书的排兵布阵产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深刻理解。第三,充分反映纂修者有关学术渊源的理论学说,完美体现了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

1.2 款目组织

《四库全书总目》的款目组织同样令人钦佩,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逻辑序列井然。该书收录一万多种图书,正式著录的有3,461种(79,309卷)，“存目”著录的有6,793种(93,550卷)。不仅规模空前,款目的组织建设也极为完备。书中正文以三级分类,具体情况是:一级类区分为四个部分,即经部、史部、

子部和集部;二级类区分为44类,诸如“经部”之易类、书类、诗类,“史部”之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子部”之儒家类、兵家类、农家类,“集部”之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三级类曰“属”,总计66子目,诸如经部“小学类”下之训诂、字书、韵书三属,史部“诏令奏议类”下之诏令、奏议两属,子部“天文算法类”下之推步、算术两属,集部“小说类”下之杂事、异闻、琐语三属等。全书所收典籍众多,总结起来洋洋200卷之巨,然而不仅毫无杂陈混乱之象,而且上下隶属之逻辑关系异常突出,真可谓按部就班,雁行有序。再次印证了宋代郑樵有关分类意义的经典理念:“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而无术耳。”^[3]

其二,信息丰富。众所周知,书目文献的主体是由诸多款目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款目应该包含两部分:一是书目著录,二是书目提要。前者旨在揭示文献的外型特征,后者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揭示文献的内容特征。两者固然都很重要,但书目提要的重要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在书目提要领域里,尤其是三大提要(按,即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中的叙录体,之所以成为后来书目提要的主流形式,决非因为其起源之早,而是因为这种形式最容易系统反映图书文献的内容信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聚集了正式著录和存目著录的上万种图书款目,所有款目都能做到全面反映文献信息。如款目不单完整著录了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等诸多事项,其中著者项包括姓名、时代、籍贯、生平简历;还采用叙录体的提要形式,深层次揭示了文献的内容,如著述过程、基本内容以及该书的重要价值。如果说这种提要形式对于原著尚存时期的读者具有一定助益的话,对于欲求其书而该书业已亡佚的后世读者就更是莫大的帮助了。

2 《史记》蕴含的目录学成就

如果以《四库全书总目》体现的极其经典的两大大要素为标准,要在《史记》中找出与之对应的内

容似乎并不困难。因为就像《四库全书总目》那样,《史记》对目录学也有突出的贡献。概括起来,司马迁对目录学的贡献主要反映于以下四个方面。

2.1 研究诸子分野,揭示学人简历

在书目文献领域里,图书分类之重要人所共知。有了科学的分类,诸多书籍才会井然有序;反之,众多书籍必然杂乱无章。然而,科学的分类离不开一个基本前提——学术思想领域的相关研究。倘若没有相应领域的研究成果,要进行科学的图书分类是难以想象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大动荡、大分化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奠基时期。此时,由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诸子林立,派别纷争。各家各派纷纷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千事物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于是出现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所谓“百家争鸣”。然而,当时到底有哪些“家”?每家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他们的学术渊源又是什么?在司马迁之前,尽管出现过诸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等梳理诸家思想的散文,但相比之下,《史记》对诸子百家的系列研究则超越了庄、荀。以《论六家要旨》为例,它深入辨析了儒、墨、名、法、道、阴阳等诸家思想,系统反映了司马迁父子关于诸子的学说。与《汉书·艺文志》相比,《史记》里虽然没有集中反映书目理论的特定部分,但是司马迁通过《天官书》、《平准书》、《十二诸侯年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有关篇章的逐一论列,尤其是采用了专传、合传、类传、附传等各种形式,系统地反映了诸子学说和成就,揭示了先秦学术发展的清晰脉络和线索。

在《史记》中,司马迁重点为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医家、纵横家、杂家七家代表人物树碑立传,反映各派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各派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关于儒家,司马迁特别设立了《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关于道家,为其创始人老子设立了个人传记——《老子列传》(见合传《老子韩非列传》),还以“附载”他人传记的形式浓缩了“庄子传记”(见

《老子列传》);关于法家,设立了《商君列传》、《韩非列传》(见《老子韩非列传》);关于兵家,设立了《孙子吴起列传》、《司马穰苴列传》、《白起王翦列传》、《淮阴侯列传》;关于医家,为著名医学家秦越人、淳于意设立了个人传记——《扁鹊列传》、《仓公列传》(见合传《扁鹊仓公列传》);关于纵横家,为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设立了两个专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关于杂家,为其代表人物吕不韦设立了专传——《吕不韦列传》。

与此同时,尽管有关阴阳家、墨家、名家、农家的文字资料比较缺乏,司马迁仍然通过“附传”形式尽可能反映这四家学术流派的文化活动。关于阴阳家,《史记》中没有阴阳家专传,但本派代表人物驺衍事迹附载于《孟子荀卿列传》、《封禅书》以及《田完世家》中;关于墨家,或许是由于早期《太史公书》部分篇章散逸之故,《史记》中居然没有墨家创始人的专传,但墨子的相关资料仍散见于《孟子荀卿列传》以及《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关于名家,《史记》中没有为名家设传记,但其代表人物公孙龙的事迹,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和《仲尼弟子列传》中依稀可见;关于农家,《史记》中没有农家专传,但其代表人物许行的事迹,则散见于《史记·货殖列传》中。

重视诸子代表人物的生平简历,也是司马迁治学的一大特色。在《史记》中,但凡涉及学术领域各派的人物,司马迁总是努力反映传主生平事迹,尽可能透露其学术思想和社会行为。此举具有两方面的基本用途:一是对一般读者了解各家各派有一定的知识普及作用;二是对层次较高学者的读书治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清人章学诚在《校讎通义》中曾专门论及此事,其中的一席话论述得恰如其分:“读《六艺略》者,必参观于《儒林列传》,犹之读《诸子略》,必参观于《孟荀》、《管晏》、《老庄申韩列传》也。《诗赋略》之《邹阳》、《枚乘》、《相如》、《扬雄》等传,《兵数略》之《孙吴》、《穰苴》等传,《数术略》之《龟策》、《日者》等传,《方技略》之《扁鹊仓公》等传,无不皆然——《艺文志》虽始于班固,而司马迁之列传,未尝不与学术渊源,文词流别,反复

而论次焉。——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4]

2.2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自章学诚将中国目录学的价值揭示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后,不少人认为这一传统由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发端。其实,早在刘氏之前的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除了《史记》中某些章节的论说外,司马迁特别通过人物传记形式揭示文化领域的学术源流,《史记》堪称是清晰再现古代学术发展脉络的一座高峰。试以《史记》中有关儒、道两家著述原委为例,其斑斑可考的记载就不失为反映诸子学术源流的佐证。

首先以儒家为例。《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关儒家经典文献的专门记载,从以下三处反映得清晰可辨。其一是关于《诗》、《书》、《礼》三部经典的论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其二是关于《易经》的描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其三是关于《诗经》的整理,这一过程更是娓娓道来:“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以上这段文字叙述颇为详尽,不单反映了《诗经》整理的前后过程和内容,而且其中不乏点睛之笔。此外,在《史记》的一些“类传”中也可以得到充分印证。例如,《儒林列传》就是一部儒学发展史,它将儒学的由来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一是孔子发端,二是七十子活动,三是秦代停滞,四是西汉复兴,五是武帝鼎盛时期。通过司马迁之如椽大笔,将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简明扼要地勾画于读者面前。

再以道家为例。有关道家重要人物庄子的学术情况,《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这样记载:“其

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在这里,虽然司马迁不过是寥寥数语,极为简练,但是庄子思想的流派渊源却显示于眼前。为了进一步揭示庄子学说的特色,司马迁还在传记末尾“太史公曰”中写道:“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通过老庄这两位领袖人物的对比,不仅指出他们的学术思想同属道家,也指出了庄学具有纵意推论的不同特点。

2.3 历数学者著述

为了使古代经典名篇扬名于后世,司马迁在诸子的传记中并非一味叙述其生平事迹,还非常注意反映其学术成就,主要用以下两种方式揭示他们的各种论著。

第一种方式:简单著录书名或篇名。对于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人物,司马迁或是直接著录,或是以自身阅读的口吻,尽量反映他们的相关著作。例如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如在《儒林列传》中,“叔孙通作《汉礼仪》”;在《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虞卿“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又如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列出孙、吴两人著作,“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又如在《管晏列传》中,列出管子、晏子著作,“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又如在《商君列传》中,“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又如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列出屈原著作篇名,“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还照录了屈原《怀沙赋》、贾谊《吊屈原赋》、《服鸟赋》的原文;又如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先后反映了四人的著作:一是老子著作,“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二是《庄子》书中的若干篇名,“《渔父》、《盗跖》、《胠箧》”;三是申

不害著述,“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四是韩非著作,逐一列出韩非书名,“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第二种方式:突出重点,抄录全文。从书目文献层面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可谓惜字如金。但也有例外,凡是他认为有重要价值或比较欣赏的著作,毫不吝惜地抄录其全篇文章。例如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以原文形式反映了韩非的《说难》篇。在这方面最为突出者,当首推《司马相如列传》,这篇传记堪称“以文传人”的杰出典型。其中,司马迁居然一字不落地全文照录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大人赋》、《封禅文》等八篇文章的原文。毫无疑问,这对于汉代及汉代以前学术领域的相应研究,特别是对同一时期校勘学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2.4 首创揭示文献的新方法

在揭示文献的方法方面,司马迁也有诸多建树。首先是“互见法”的首创和应用。《史记》中的所谓“互见法”,就是通过巧妙安排材料,突出主要人物的事迹和性格,亦即后人所谓“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表现方法。司马迁采用“互见法”与重视人物形象统一性有关。基于既不妨碍统一、又要忠于史实这一宗旨,仅在特定人物传记中比较详细地反映该人生平事迹,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涉及此事,便只是简明提示而不再重复记载。当然“互见法”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如果考察其原始萌芽,似乎一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左传》。然而,将这种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纪传体文献中,则毫无疑问发端于《史记》。从《史记》里可以看到,司马迁在许多地方使用了“互见法”。例如鸿门宴在《项羽本纪》已有详细叙述,《留侯世家》涉及此事时,仅言“语在《项羽》事中”;在《淮阴侯列传》中详尽叙述了萧何推荐韩信为大将军,《萧相国世家》中仅言“语在《淮阴侯》事中”。如此等等,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诚然应该承认,《史记》中使用的所谓“互见法”,主要是局限于人物事迹之间的彼此“互

见”。但是,当东汉班固等人受到这一方法的启发,将其引用于书目文献领域后,由此产生的两项意义便引人注目了:一是因为“互见法”的引用,可以避免重复记载,减少文字篇幅;二是因为彼此互见,还可以扩大读者检索利用信息的渠道。

其次是《史记》中的第一百三十篇《太史公自序》尤为引人注目。它形式上列于全书殿军之位,实则相当于今天的“序言”,亦即《史记》全书的总序。该篇在系统反应司马氏世系、家学渊源、著述经过与写作动机的同时,对《史记》各篇逐一点评,开启了后世书目文献领域中“解题”、“摘要”之先河,其深远影响不可低估。

3 班固《汉书·艺文志》与司马迁《史记》

放眼于古代各种书目文献,能与司马迁《史记》发生密切关系者,首推班固《汉书·艺文志》。这不仅因为两书作者均系著名史学家(按,一位是纪传体通史之开山,一位是纪传体断代史的鼻祖),还因为两书在“书目文献”这一层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第一部大型书目《七略》散佚以后,《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成了《七略》的“复制品”。正因为如此,只要关乎汉代以前文献领域的读书治学,《汉书·艺文志》就会显示出其他任何书目文献都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清人金榜的一席话说得相当到位:“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

然而即便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也无法掩盖司马迁做出的贡献。

3.1 同样以国史平台展示图书文献

司马迁深谙史学功能,开启了以正史反映古代历史文化的先河。对于司马迁的这一首创,班固有继承,也有发展。姑且不论《汉书》中的纪、表 and 列传,即便从反应典章制度的“十志”中也可找到许多例证;其中的《礼乐志》、《律历志》、《天文志》、《郊祀志》、《沟洫志》、《食货志》等“六志”乃是分别

从《史记》的《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演变而来,即便是《汉书》中用以揭示图书文献的《艺文志》也有同样情况。诚然《史记》中没有“艺文志”那样的专篇,然而只要将《汉书·艺文志》与《史记》认真对比,两者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司马迁以国史反映古代文化的伟大创举直接催生了《汉书》“艺文志”的出现。当然,班固在借鉴司马迁创举的同时,并非简单把刘歆《七略》整块置于国史,也做了一些改造工作。事实证明,当班固借鉴了司马迁的智慧首创,将“艺文志”这种形式嫁接于正史后,真可谓实现了强强联合的双赢:不仅大大提升了正史的含金量,扩大了正史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书目文献自身的学术地位,而且从此还为后人检索信息资源提供了一个永不消失的重要平台。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层面来理解。即由于“艺文志”板块加盟正史,不单可以反映我国历史上的一代藏书之盛或一代著述之盛,还可以体现书目文献的另一种文化功能:“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具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5]

3.2 同样重视学术流派的辨析

如果说司马迁《史记》中已经体现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理念,那么班固不仅像司马迁那样重视这种思想理论,还往往从《史记》中汲取相应营养,以确立自己的理论观点。

以“诸子百家”的研究为例。刘歆《七略》中曾为先秦诸子列出了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汉书·艺文志》基本沿袭了刘歆“十家”之说。但是,班固又有所保留:“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言外之意,还有“不可观者”一家,这就是置于“十家”之末的“小说家”。班固对“小说家”的保留态度耐人寻味,这究竟为什么呢?原来答案出在司马迁那里。

所谓“小说家”,如果按照鲁迅的观点,其性质实则属于“半人半神”的古代传说而已^[6]。考察

《史记》一百三十篇,虽然也能从中偶然发现所谓“小说家”的痕迹(按,例如瞽叟加害帝舜事,见《五帝本纪》,又如刘媪与龙交而诞刘邦事,见《高祖本纪》等)。然而,这在《史记》中仅仅是只言片语的个案。若从整体上看,司马迁对“小说家”的态度则是基本否定的。究其表现有二:一是司马迁从未为“小说家”立传。虽然《史记》传记覆盖了刘歆“十家”中的绝大多数,甚至还多出了兵家和医家,然而唯独没有“小说家”。不仅在专传、合传或类传等传记中没有触及,即使“附传”中也没有其连带信息。二是司马迁对“小说家”始终持怀疑态度。例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择其言尤雅者”;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五帝、三代之记,尚矣”,“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由此可见,在班固对“小说家”的保留态度中,不难发现司马迁《史记》的重要影响。

3.3 同样重视图书层面的内在联系

《史记》之所以被后人高度赞扬并认定为“信史”,这与司马迁严谨治学的态度有关系。犹如世人高度认可司马迁那样,班固对《史记》中的记载也有很高的信赖度。只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认真考察,就很容易看出《汉书·艺文志》与《史记》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

其一,自觉与《史记》建立互动。对比两书,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凡是《汉书·艺文志》所录文献能与《史记》建立联系者,班固总是特别注明,以飨读者。仅以《汉书·艺文志》里儒学“五十三家”为例,就出现了四处:“《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孙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鲁仲连子》十四篇。有列传。”这里的所谓“有列传”三字,究竟所指为何物呢?唐代大儒颜师古在班固所谓“《晏子》八篇”之后,特别以注释形式标明:“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

其二,以《史记》记载为佐证。如上所述,《汉书·艺文志》大体上是刘歆《七略》的“复制品”,主体内容大部分雷同,也有些属于不同见解。然而,考察其中的一些“不同见解”,居然能与《史记》中的文字记载相关。试以儒家《春秋》经的研究为例。《史记·儒林列传》云:“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从此,“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刘歆显然不同意《史记》的观点,《七略》中肯定的人物是左丘明:“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汉志·春秋类序》)然而,班固却又根据司马迁见解而否定刘歆观点:“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7]

其三,同样重视互见法的应用。司马迁在《史记》人物传记中创建了“互见法”。班固在《汉书》的众多人物传记中也采用了“互见法”,甚至还把这种方法引进到《汉书·艺文志》中广泛应用。例如“《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魏公子》二十一篇。图十卷。名无忌,有列传。”“《蚩尤》二篇。见《吕刑》。”等等。

两相对照,不仅可以看出《汉书·艺文志》与《史记》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更可以看出司马迁《史记》对《汉书·艺文志》的重要影响。

4 司马迁目录学成就点评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千事物,纷繁复杂。从历史上看,出现为事物定性或定位并不尽然者所在多有。以司马迁为例,只要提起这个名字,人们脑海中就会立刻闪现出属于他的两顶桂冠:伟大的史学家,伟大的文学家,其实司马迁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在目录学领域里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或许是由于他头顶上的前两个光环太过耀眼,所以不少人一个时期以来忽略了他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存在,至于他在目录学领域的成就更是长期被淹没于其它华丽的光环中。

笔者愿借此文对其在目录学领域的成就予以

评价。

4.1 奠基之功

中国古代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目录《七略》完成于汉成帝年间,而早在汉成帝之前的汉武帝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已经问世了。《七略》彻底亡佚后,其基本成就主要通过《汉书·艺文志》得以体现。

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有句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书·艺文志》的光芒虽然离不开刘歆《七略》的深厚基础,但也离不开司马迁目录学成就的巨大影响。倘若追根溯源,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司马迁《史记》的成就在前,姑且不论会否直接影响到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即使对刘歆的《七略》而言,起码会影响到该书中诸如诸子百家的理论根基。

前面说过,《史记》中确实没有《汉书·艺文志》那样反映图书文献的专篇。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位立志高远的史学巨匠,平心而论,要完成《汉书·艺文志》那样的“专篇”,既非司马迁不想,亦非司马迁不能。《史记》中之所以缺失《艺文志》那样的论著,主要是因为当时尚未出现《七略》那样全面普查皇家藏书的基础性成果。然而即便面对如此不利局面,司马迁依然在目录学宏观层面做出了不容忽略的卓越贡献。例如他开启了于正史中反映文化成就的先河,深入论述了诸子百家的分野,撰写了五彩缤纷的学者传记,著录了各家学术流派的一系列成果,开创了影响后世的“互见法”的应用,等等。上述任何一项创举,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4.2 “隐形”之辨

在长期被视为“显学”的目录学领域里,榜上有名的大家不胜枚举。诸如官修书目领域之刘向、刘歆、荀勖、纪昀,史志书目领域之班固、魏征、郑樵、焦竑,私修书目领域之王俭、阮孝绪、晁公武、陈振孙等,真可谓明星闪耀。然而在一列列“明星”

队伍中仔细搜寻,却怎么也看不到司马迁那原本不该置身事外的踪影。这既是对司马迁认同的不公,也是目录学领域里不应该出现的重大缺失!

究其原委,实在与司马迁成就的表现形式有重要关系。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说过:“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8]用姚氏这一理念考察,司马迁在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于对事物的分类和对学术的分类,至于图书文献方面的分类,则主要反映于诸子百家传记中的简单“著录”。此外,从文献性质上界定,《史记》确实属于史籍,而且正文中也没有班固《汉书》里旨在揭示图书文献的专篇“艺文志”。如果就此而言,将《史记》排斥于书目文献之外似乎也不足怪。然而在以上所说的各个方面,司马迁毕竟做出了举世瞩目的重要贡献。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史记》是一部具有特殊表现形式的书目文献,质言之,它是一部规模空前的隐性书目文献。

因为是“特殊表现形式”的“隐性书目文献”,所以通常情况下便不易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为了揭示问题的真相,我们最好将班固《汉书·艺文志》与司马迁《史记》认真比较,以便从各个角度的对比中探究一二。

试看:《汉书·艺文志》是通过图书分类反映诸子百家的学术成果,而《史记》是通过不同类型的人物事迹揭示学术流派的文化成就。一个是以集中模块为载体,一个是以分散形式为平台;一个是集中于文字著录,一个是着重于生平表现;一个是传统的平面形式,一个是罕见的立体姿态。前者是显性的展示,后者是隐性的反映。或许正是由于上述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形式,最终导致这样的结果:前者成为习以为常的正宗,后者则成为熟视无睹的异类。然而,笔者经过反复思考后则认为,班、马之书好有一比:班氏之书譬如滔滔江河,司马之书酷似上游滥觞。凡大河必有源头,无滥觞无以成江河。

回顾目录学数千年发展史,司马迁当年所做的奠基性劳动,不仅早于刘歆的《七略》,更早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七略》与《汉书·艺文志》长

期被视为古代杰出的书目文献,刘歆、班固也一直位居杰出目录学家之列,然而为此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司马迁,却因为劳动成果的“隐性”表现形式,长期陷于门可罗雀的“冷宫”世界。

司马迁所在的汉武帝时期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认真盘点,还

原历史本来面貌,为司马迁在目录学领域的成就讨个公道呢?诚然,这个问题极具复杂性和专业性,所谓讨“公道”之说谈何容易!但是,“实事求是”毕竟是当代学者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笔者思之再三,最终还是斗胆撰写了这篇文章,而且浓缩出了以上的题名。

参考文献

- [1]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Wang Mingsheng. Critical study of the Seventeen Dynastic Histories[M].Shanghai: Shanhai Bookstore Press,2005.)
- [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3.(Yong Rong, et al. Imperial collection of Sikuquanshu[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3.)
- [3] 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Zheng Qiao. Tong zh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7.)
- [4]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Zhang Xuecheng.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Wenshitongy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 [5] 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N].人民日报,1959-4-8.(Guo Moruo. About the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history[N]. People's Daily, 1959-4-8.)
- [6]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M]//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Lu Xun. The history change of Chinese novels[M]//Lu Xun complete work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96.)
- [7]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Ban Gu. Hanshu[M].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3.)
- [8]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Yao Mingda. History of Chinese bibliography[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1936.)

王锦贵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邮编:100081。

(收稿日期:2013-11-14)